

論一元論历史觀之发展

普列汉諾夫著

博古譯

第四分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政治和經濟之間的互相作用是有的。这是無疑的，正如卡列也夫先生之不理解馬克思一樣地無疑。但是互相作用之存在是否禁止我們更進一步去分析社會生活呢？不，如果這樣想，就等於說認為卡列也夫先生所表現的不理解可以妨礙我們去獲得正確的歷史哲學的概念。

政治制度影響於經濟生活。它們或者**促進**這個生活的发展，或者**阻礙**它。前一種情形從馬克思的觀點上來看絲毫也不足為奇的，因為特定的政治體系之被創造起來就是為着**促進生產力的往前發展**（至於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被創造出來——在這裡對於我們是完全一樣的）。後一種情形絲毫也不與這個觀點矛盾，因為歷史的經驗證明，既然特定的政治體系不再適合於生產力的狀態，一旦它變成了生產力往前發展的障礙，那末它便開始走向沒落，最後，被排除掉。不僅是這個情形不與馬克思的學說矛盾，而且它最好地証實了馬克思的學說，因為正是它指明：在什麼意義上經濟統治着政治，生產力的發展怎樣先於人民的政治發展。

經濟的進化引起法權的變革。對於**形而上學者**，這點是不容易理解的，因為他雖然高叫着互相作用，卻慣於一個一個地並且互不相涉地來觀察現象。相反地，即使多少能夠作**辯證**思惟的人就不難了解這點。他知道：**量的變化**，逐漸地累積着，最後，引導到**質的變化**，而這些質的變化乃是**飛躍、漸近性中斷**的契機。

这里，我們的論敵們便受不住了，拿出他們的“言談和公事”⁷⁹来了。他們叫道：看啊！黑格尔才是这样說的啊！我們回答道：**全部自然界便是这样做的。**

說話容易做事难。把这句俗語用到历史上就可以把它变为：說話很簡單，而事情做起来却非常之复杂。說生产力的发展引起法权制度中的变化，这是很容易的！这些变革乃是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各个成員的利害的結合是极其奇妙的。一些人利于維持旧秩序——他們用一切他們所能用的手段来保持它。对于另一些人，旧秩序已經是有害的和可恨的了——他們以其所有的全部力量来攻击它。而且不止如此。革新者的利益亦远不是經常同样的：对于一些人，某些改革比較重要，对另一些人是另一些改革比較重要。爭論在改革者的营垒中产生出来了，斗争更复杂化了。而且，虽然按卡列也夫先生的公允的說法，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組成的，爭取最无可怀疑的物质利益的斗争却必然地在爭論的双方面前提出最无可怀疑的精神上的問題：**关于正义的問題**。旧制度和正义矛盾到什么地步？新要求 and 正义适合到什么程度？这些問題必然在斗争者的头脑中产生出来，虽然，斗争者并不总是簡單地称正义为正义，而也許会把它人格化为类人的或者甚至类兽的神。所以，違反着卡列也夫先生施加給他們的咒語，“肉体”产生“灵魂”，即**經濟斗争引起道德問題**，而“灵魂”在亲近的观察下成了“肉体”，因为**守旧者**

的“正义”常常就是剝削者的利益。

那些以惊人的机智厚誣馬克思为否认政治的意义的人们同时又断言：馬克思不論对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和美学的概念，都不給以任何意义，到处只单单看到“經濟的”概念。这又是如謝德林所說的，不自然的空話。馬克思沒有否认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他只是闡明了它們的起源。

“什么是电气？——运动的特殊的种类。什么是热？——运动的特殊的种类。什么是光？——运动的特殊的种类。啊！竟是这样嗎！那末你就不給光、热和电气以意义嗎？在你那里，一切都是一个运动；概念是如何片面，如何狹窄啊！”正是这样，先生，正是狹窄。你是清楚地懂得能的轉化的学說的意义的。

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特定的阶段必然地引起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們的一定的結合，即一定的生产关系，亦即整个社会的一定的結構。而既然有了社会的結構，就不难了解，它的性质将一般地反映于人們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于他們的一切习惯、風俗、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之上。习惯、風俗、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地應該适应于人們的生活式样，适应于他們的获得食料的方式（用別舍尔的話來說）。社会的心理永远順从它的經濟的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这里重复着希腊哲学家在自然中看到的現象：合目的的东西胜利着，其原因很簡單，凡不合目的的

东西，由于自己的性质而命定地要趋于死亡。在社会的争取生存的斗争中，这种社会的心理适应于社会的经济的情况，对于社会是否有利的呢？很有利的，因为不适合于经济的，和生存条件矛盾的习惯与观点，将妨害这个生存的维护。合目的的心理之有益于社会，正如很好地符合于自己目的的器官之有益于机体一样。可是，说动物的器官应该适合于它们的生存条件，是否就是说，器官对于动物没有意义呢？完全相反。这是说，承认它们的巨大的意义，它们的**重大的意义**。只有异常贫弱的头脑才会作另一样的理解。先生，这对心理是完全一样的，正是完全一样的。当承认它适应于社会经济时，马克思同时便承认了它的巨大的、什么也不能替代它的意义。

马克思和例如卡列也夫先生之间的区别，在这里归结为：后者虽然有其对“合命题”的爱好，仍旧是最纯粹的二元论者。在他那里，这里是经济，那里是心理；在一个袋子里——灵魂，在另一个袋子里——肉体。在这两个实体之间有着互相作用，可是两者都进行着其独立的存在，这个存在的来源则为不知之暗雾笼罩着^①。马克思的观点消除了这个二元论。在他那里，**社会经济和它的心理**乃是人们的“生活的生产”、他们争取生存的斗争这同一

① 不要以为：我们在污蔑可敬的教授。他赞不绝口地引用巴尔特的话：“法进行着独立的，虽不是非依赖的生存”。而这个“独立性，虽然不是非依赖性”就妨害了卡列也夫先生去认识“历史过程的本质”。怎样妨害，我们在**正文**中马上就有一节来说明。

現象的兩方面，在鬥爭中人們由於生產力的特定狀態而以某種方式結合着。爭取生存的鬥爭創造他們的**經濟**，而在經濟的基礎上生長他們的**心理**。經濟本身亦是派生的東西，正如心理一樣。正因為如此，任何進步着的社會的經濟是**變化着的**：生產力的新的狀態引起新的經濟結構，同樣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時代精神”。從這裡便可明白，只有在通俗的演說中才能說經濟是一切社會現象的**最初的原因**。遠在成為最初原因之前，它本身是結果，是生產力的“功能”。

現在我們來說到在附注中所預約過的那一節。“不論肉體以及靈魂都有自己的需要，這些需要找尋自己的滿足並將各個人置於對外部世界即對自然和別的人們的各種不同的關係中……人對自然的關係依賴於各個人的物質的和精神的需要，並因此，一方面創造用以保證各個人的物質生存的各种技藝；另一方面則創造全部智慧和道德的文化。……”⁸⁰ 人對自然的物質關係根源於肉體的需要中、物質的屬性中。“狩獵、畜牧、農業、製造工業、商業和貨幣流通的原因”應該在肉體的需要中去找。——從健全的判斷看來，這當然是這樣的：因為如果沒有了肉體，我們還需要家畜和野獸、土地和機器、商業和金子干嗎？但是，另一方面，亦應該說：沒有靈魂的肉體是什麼呢？那不過是物質罷了，而物質是死的。因為物質本身如果不是由靈魂和肉體組成的，那末它便什麼也不能創

造。所以捕捉野兽、驯养家畜、耕种土地、做生意和在銀行里开会，物质不是以自己的智慧来实行的，而是按着灵魂的指示的。所以，人对自然的物质关系的发生的最后原因应该在灵魂中去找寻。所以，灵魂亦有双重的需要；所以，它亦是由灵魂与肉体组成的，而这便有些不大说得通。然而这还不够。而且对于下面这点亦自然而然地要发生疑问。卡列也夫认为，在肉体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人对自然的物质关系。可是这是否确切呢？只是对自然的嗎？卡列也夫先生也许还记得，修道院院长吉貝尔怎样咒詛那力图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城市公社，这些“卑污的”机关，說其存在的唯一目的，似乎只是想逃避封建义务的公允的执行。在这里，在修道院院长吉貝尔身上說話的是什么呢：“肉体”还是“灵魂”？如果是“肉体”，那末我又將說：所以，肉体亦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而假如是“灵魂”，那末，所以它亦是“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因为在这里，它很少表现对于现象的无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按卡列也夫先生說来乃是“灵魂”的特点。这里你們試一試弄清这笔糊涂賬吧！也許，卡列也夫先生会說：在修道院院长吉貝尔身上說話的实在是灵魂，不过它是在肉体的命令之下說的，而在狩猎、銀行等等事情上亦是一样。但是，第一，为了要能命令，肉体仍然应该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而第二，粗野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指摘道：看呵！灵魂是在肉体命令之下說話的，所以，

人是由肉体 and 灵魂組成的这一点依然什么也不能保证：也許在全部历史上灵魂只做了按照肉体的命令說話的事情？当然，卡列也夫先生是会被这个可厌的設想激怒起来而来駁复“粗野的唯物主义者”的。我們坚信，胜利是在可尊敬的教授方面的，可是在这斗争中，那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組成的这一无可爭辯的事实究竟能对他有多少帮助呢？

而且还不止如此。我們在卡列也夫先生那里讀到，在每个人的精神的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神話和宗教……文学和美术”和一般地——“对外部世界（以及对自己）的，对存在与認識問題的理論关系”，以及“外部現象（以及自己本身的思想）的无私的、創造的再現”。我們相信了卡列也夫先生。可是……我們有一位朋友，他是工科学生，热心地研究制造工业的技术，但是在他那里对于教授先生所列举的东西的“理論的”关系却没有发现。我們发生了一个問題，我們的朋友是否单单由肉体組成的？我們請求卡列也夫先生快些解决这个煩惱着我們并且使年青有为、甚至也許是天才的技师难受的疑問吧！

假如卡列也夫先生的議論有多少意义的話，那末它就在：人有高級低級的需要：有利己的傾向和爱他的感情。这是最无可爭論的真理，可是完全不能成为“历史哲学”的基础。帶着这种真理决不会比无內容的早已被击破了的关于人性这一題目的議論走得更远，因为这种真

理本身亦不过是这种議論而已。

當我們和卡列也夫先生談話時，我們的聰明的論敵已經來得及捉住我們的自相矛盾，主要地我們與馬克思之間的矛盾。我們說過經濟不是一切社會現象的最初原因，而同時我們斷言：社會心理適應于它的經濟——第一個矛盾。我們說：社會經濟和社會心理乃是同一現象的兩個方面，而馬克思本人則說，經濟是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賴以樹立起來的現實基礎，——第二個矛盾，而因為在這裡我們與我們正在敘述其觀點的人有了分歧，所以這個矛盾對我們說來就尤其不光彩。讓我們解釋一下吧。

說社會歷史過程的基本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這我們說得一字一句都和馬克思一樣的，所以這裡任何矛盾也沒有。所以，如果要有矛盾，那末只在社會經濟對社會心理的關係這個問題上。我們來看一看到底有沒有矛盾。

請讀者記住，私有財產是怎樣產生的。生產力的發展把人們置于這樣一種生產關係中，在這種關係下，某些對象的個人的占有對於生產過程成了更加便利的。適合于這種情況，原始人的法權概念變化了。社會的**心理**適應于它的**經濟**。在特定的**經濟基礎**上命定地建築着適合于它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可是，另一方面，在生產力發展上的每一個新步驟把日常生活的實踐中的人置于新的互相關係中，這個新的關係是和舊的過時的生產關係不相

适合的。这个新的从未有过的情况必然地反映于人们的心理上，有力地改变着它。向哪一个方向呢？社会的一些成员坚持旧制度，这是停滞的人们。另一些人——旧制度对他们不利的人们，赞成前进的运动；他们的心理变向那随着时间的到来将会代替旧的、过时的经济关系的生产关系方面去了。可以看到，心理对于经济的适应继续着，可是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①。

当这个革命完成之后，就建立了社会心理与经济之间的完全的适合。这时候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新的心理怒放起来。在一段时期中这种适合是不可破坏的；它甚至日益巩固起来。可是慢慢地新的不和之芽又出现了：先进阶级的心理，依着上面指述的原因，又驾凌于旧的生产关系之上：由于一分钟也不停止它的适应于经济，它又去适应那组成将来的经济的萌芽的新的生产关系。这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吗？

直到现在我們主要地用财产法领域内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法无疑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过是第一级的，所谓低级的意识形态。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高级的意识形态，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观点呢？

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发展上，经济在下述意义上是基础，即社会应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以便抽出一定的人

^① 实质上，现在欧洲的无产阶级正经历着这同一的心理过程：它的心理已经适应着新的、将来的生产关系。

力，以全力专门从事科学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其次上引的柏拉图和普卢塔克的观点指明：社会内脑力工作的**方向**本身亦是为它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关于科学，维科就已经说过，它是由社会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科学，稍稍知道其历史的人都是明白这一点的。别基奥伯爵公允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特别证实，实践到处和永远先于科学^①。当然这点也可以在极抽象的意义上加以解释的；可以说：“显然，科学需要经验，经验愈多，科学愈圆满。”事情不在这里。请将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的经济观点和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一下，那末你便可以看到在一方面，古希腊的经济科学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科学之间有着不仅量的而且质的差别：完全另一点的观点，完全另一点的对对象的态度。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差别呢？很简单，就是**现象本身变化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不像古代的生产关系。在生产中的不同的关系创造了科学上的不同的观点。不仅如此，请把李嘉图的观点和例如巴斯夏的观点比较一下，那末，你就可以看到，对于**按其一般性质**说来未尝变化的生产关

^① “当政治经济学在十七世纪中开始萌芽以前，某几个民族在几世纪中只靠自己的实践而活过了。这个经验以后为科学利用为自己的定理”——（“意大利之政治经济学史”，洛加诺，1892年，第11页）。

密勒重复道：“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实践是老早就先于科学而存在着……所以，理解政治经济学为科学的一个部门，这种理解产生得还不久。可是它的研究的对象必然地是在一切时代中人类的主要的实践利益之一。”（“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伦敦，1843年，第1卷，第1页。）

系——**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有不同的看法。為什麼？因為，在李嘉圖時代這些關係還剛剛興盛，還剛才鞏固起來，而在巴斯夏時代，這些關係已經開始走向沒落。同一生產關係的不同的狀況必然地應該反映於擁護它的人們的觀點中。

或者以國家法權科學來說。它的理論怎樣和為什麼發展起來的呢？“國家法權科學的研究——龔普洛維奇教授說——只有在統治階級之間為了屬於它們的權力的範圍而發生爭執的時候才開始。例如，我們在歐洲中世紀下半期所遇見的第一次大的政治鬥爭，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之間的鬥爭，皇帝與教皇之間的鬥爭，給了德國國家法權科學的發展以第一次的推動。使統治階級內部分裂和推動國家法權相當部分的政論性研究的第二個政治爭論問題是關於皇帝的推選問題。”^①

什麼是階級的互相關系呢？這首先就是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彼此之間的關係：**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在社會的政治組織中和在各階級的政治鬥爭中得到自己的表現，而這個鬥爭成為各種**政治理論**產生和發展的動力：在經濟基礎上必然地建築起適應於它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

然而就是這些意識形態，如果不是最初級的，却也決

^① 《Rechtsstaat und Sozialismus》，Innsbruck，1881，S. S. 124～125。（“法權國家與社會主義”，因斯勃魯克，1881年，第124—125頁。）

不是最高級的意識形態。例如，哲學、藝術的情形是怎樣呢？在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應得稍微后退一點。

愛爾維修曾從 *l'homme n'est que sensibilité*^① 這一命題出發。從這個觀點看來，很明白的，人將避免不愉快的感覺和力求獲得愉快的感覺。這是感覺的物質的不可避免的天然的利己主義。可是，假如如此，那末，人怎樣發生完全無私的意圖：對真理之愛，英雄主義呢？這是愛爾維修應解決的任務。他沒有能夠解決它，而為了逃避困難，他簡簡單單地將他要求得的那個 X，那個未知數划掉。他說，沒有一個學者會無私地愛好真理，每個人都只是把真理看做走向榮譽的道路，把榮譽看做獲得金錢的道路，而把金錢看做獲得生理的愉快感覺的手段——例如用以買得美味的食品或 *belles esclaves*^②。不必說，這種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它只表現了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的法國形而上學唯物主義之無法解決發展的問題。

人們常將這種不外是重複愛爾維修的形而上學論點的对人類思想史的观点强加于現代辯證唯物主義之父的頭上。例如對馬克思的哲學史观点常常理解為近似這樣：如果康德研究了先驗論的美學的問題，如果他說了悟性的範疇或理性的二律背反，那末在他那里，這只不過是一些空話，實際上，不論美學，不論二律背反，不論範疇對

① 〔人只有感覺性〕。

② 〔很好的奴隸〕。

他都毫无兴趣；他需要的只是一件事：給他所屬的階級，即德國的小資產階級以更多的美味的菜肴和“很好的奴隸”。范疇和二律背反在他看來是達到這點的最好的手段，所以他才來“分析”它們。

難道還需要說明：這是最純粹的空談嗎？當馬克思說，特定的理論適合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某一時期時，他絕不想以此說，在這個時期內統治着的階級的思想代表自覺地將自己的觀點去迎合自己的多少富裕和多少寬大的恩人的利益。

當然，阿諛者到處和永遠都有的，可是推動人類理性前進的卻不是他們。而那些真正推動人類理性前進的人，卻關心着真理，而不是關心當時世界的強有力者的利益^①。

“在所有權的不同的形態上——馬克思寫道——在社會的生存條件之上建築着不同的特殊的感覺和幻想、觀點和概念的整個上層建築。所有這些都是為整個階級根據其生存的物质條件及適合這些條件的社會關係所創造和形成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產生的過程是在人們**不知不覺之中**完成的。人們不把這個上層建築看做一時的關係的一時的結果，而看做是按其本質說來是天然的和必定如此的東西。個別的人（他們的觀點、感覺是在教育

^① 這不妨害他有時候害怕強有力者。例如，康德關於自己曾說過：“誰也不能強迫我說與我所想的相反的話，可是，我不敢說出我想的一切。”

和一般地周圍环境影响之下造成的)可能对于那些历史地在或多或少**狹隘的階級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和共同生活的形式充滿着最誠懇的、**最忘我的态度**。整个政党亦是一样。1848年的法国的民主派表現着小資產階級的意图。小資產階級天然地力图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可是，——馬克思写道，——如果以为小資產階級自觉地力图維護利己主义的階級利益，那将是眼光狹小的。相反地，它以为它的解放的**局部的**条件乃是一种一般的条件，而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达到拯救現代社会和消除階級斗争。同样不要以为小資產階級的一切代表都是小生意人或小生意人的崇拜者。按其教育和个人地位，他們可能与小生意人有天壤之別。可是下述情形就使他們成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即他們的思想沒有走出小資產階級生活环境的界限，而因此，他們在理論上达到那小資產階級由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而在实际中所达到的同一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地在某一階級的政治的或文学的代表和这个階級的本身之間的关系就是这样。”^①

① 当证明生活条件 (les circonstances) 影响于动物的机体时，拉馬克做过一个注解，这注解值得提一提，以避免誤会。“誰停止在我所說的話的字面的意义上——他写道——他便会將錯誤的观点加在我的头上。因为無論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它們都不会在动物的形态和組織上引起任何直接的变化。”由于生活条件中的重大的变动，在动物那里出現了新的与以前不同的需要。假如这些新的需要在很长久的时期中保持不变，那末，他們便引导到新的**习惯**的出現。“而既然新的生活条件……引起动物的新的**习惯**，即刺激他們作已經成了习惯的新动作——結果則一些器官常常得到較多的鍛炼，而有时那失去了用处的另一些器官則完全沒有鍛炼。”鍛炼的加紧或沒有鍛炼对于

这是馬克思在論拿破侖第三的 coup d'état^② 的一书中說的⁸¹。在其另一著作中，他也許更好地給我們解釋階級的**心理的辯证法**。他讲的是有时个别的阶级所起的那个解放者的作用的問題。

“如果不在暫時間激起本阶级和群众的热情，任何阶级都不能起这个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它与整个社会亲如手足，它被认为是**全体的代表**，大家同情它；在这一时期中，这个阶级的权利与要求真正是全社会的权利与要求，而这个阶级本身是这个社会的头脑和心臟。只是以社会的**全体的权利**的名义，某一阶级才能要求自己对于一切其他人的統治。为了担起这个解放者的作用以及使一切社会領域为自己本身的領域服务的政治剝削者的作用，仅仅靠热情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为了要使一个等級能表现为似乎是代表全社会的，那末就需要一切社会的仇恨都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需要一定的等級成为引起公憤的等級、压迫一切人的化身……为使一个等級 par excellence(真正)成为解放

器官的結構以及整个机体不是沒有影响的。(Lamarque, Philosophie zoologique etc., nouvelle édition par Charles Martin, 1873, t. I, pp. 223~224.) (拉馬克,“动物学的哲学等等”,查礼·馬尔丁新版,1873年,第1卷,第223—224頁。)經濟的及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其他需要对于国民心理的影响亦應該这样理解。这里发生着由于鍛炼和不鍛炼的結果而生的緩慢的适应的过程;而我們的“經濟”唯物主义的敌人們以为:似乎照馬克思的意見,人們在出現新的需要时,馬上便有意地改变自己的观点。显然,这在他們看来是一件蠢事。但是这种蠢事是他們自己想出来的,在馬克思那里絕沒有类似这样的东西。一般地說,这些思想家的反对意見,使我們記起一个神父反对达尔文的胜利的論据:“达尔文說把鸡拋到水里去,它便生出蹼来,而我則断言,鸡簡簡單單地会淹死。”

② [政变]。

者的等級，需要另一個等級，在一般的意識中，相反地成為奴役者的等級。法国的貴族和僧侶的消极的普遍的意义制約了和他們邻接的及反对他們的資產階級的积极的普遍的意义。”^①

在这些預先的解釋之后，已經不难弄清楚，馬克思對於高級的意識形態，例如對於哲學和對於藝術的觀點。可是為着更大的明顯性，我們將它和伊·泰恩的觀點對比一下：

“為着理解某一藝術作品，某一藝人，某一藝人的集團——這位作家寫道——應該确切地知道，他們的時代的智慧和道德風習的一般狀況。那里是最后的解釋；那里有着決定其他一切的最初的原因。經驗証實着這個真理。實際上，如果我們追蹤藝術歷史的主要時代，則我們可以看見，藝術與他們聯結着的智慧及道德風習的一定的狀況同時出現和同時消失。例如，希臘的悲劇——愛修拉斯、蘇福克拉斯、幼里披底的悲劇——是和希臘人之戰勝波斯人同時出現的，它出現於不大的城市共和國的英勇的時代，出現於那偉大的緊張的時機，由於這，他們奪得了自己的獨立並在文明世界中確立了自己的領導權。這個悲劇同這個獨立和這個熱情同時消失了，當氣節的頹敗和馬其頓的侵略使希臘落於異族的統治之下的時候。——完全同樣地，哥特式建築之發展是和十一世紀的半文藝復興時代的封建秩序的最

①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Paris，1844，《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Einleitung》，S. 82. 82（“德法年鑑”，巴黎，1844年，論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第82頁。）